

电子图书



信息技术的结晶

人类文明的载体

网络的基本资源

总 论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从事学术研究工作，同样少不了要利用工具书，因为，一个人即使读书很多，而且非常专心致志，他也不可能把所有的知识和材料都记在脑子里。因此，对于青年同志来说，就更有必要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和认真钻研专业的同时，了解各类工具书的历史、现状及其使用方法，培养自己利用工具书进行独立工作的能力，以便在学习或从事教学科研的过程中，力求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本书即为适应上述需要而编写。

在分别论述各章之前，兹将工具书的名称和作用、我国工具书发展的简况、工具书的种类和本书的介绍方式、怎样使用工具书等问题，作一个概括的说明。

一、工具书的名称和作用

所谓工具书，顾名思义，是指在学习或工作时可以作为工具使用的特定类型的图书。倘若一定要给它下一个定义，可简略地这样说：凡用一定的观点收集某种资料并按一定的方法编排起来供人查考的图书，即可称之为工具书。

一般图书是工具书的原始材料，工具书是在一般图书的基础上进行选材和重新组织编排的加工品。一般图书主要是供人阅读用的，工具书则是供质疑解惑时查考用的。二者之间有区别，这是不言而喻的；但又并非绝对的，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例如，象《四库全书总目》这样典型的工具书，它既可供人翻检，又可供人阅读。类书、政书是查找古代事物和典章制度的工具，但也可部分供人阅读。与此相反，一些供人阅读的图书，即如《史记》、《汉书》这样的史学名著，其本纪、列传可供查考人物之用，书（志）、表部分更明显的具有工具书的性能，除供人阅读之外当然也可供人查考。有鉴于此，本书编写各章节时，一方面主要是介绍大家公认的重要工具书，另一方面又根据实际需要，对少数从严格意义上说本不是工具书，而查考问题时确有某种实用价值的图书作了附带的介绍。总之，我们认为，工具书与非工具书只是相对而言，重要的是解决实际问题，而不必过于拘泥于名称或形式上的区别。有人说，凡是从事某种工作需要经常查考的图书，都可以叫做工具书。这话有一定的道理。

古代由于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水平的限制，图书不如今天这么多、这么复杂，而且那时的读书，强调靠记忆，所以对工具书的需要也远远不如今天这么迫切。随着社会的发展、科学门类的日趋精细和各类图书的急剧增加，人们面对浩如烟海的书报杂志，如果没有工具书作为输助，要想广泛收集某种资料进行科学研究，那简直就象大海捞针一样困难。而且正因为要读

的书太多，要研究的问题太多，就更感到时间特别宝贵。一旦在学习或工作中遇到问题即使只需要查考一本书，如果没有检索工具就难以解决问题。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客观形势的需要，工具书的编制也日益增多，并且是“日新月异，后出转精”。

讲到工具书的作用，那确是多方面的。概括地说来，它可以指点读书的门径，解决我们在学习和工作中遇到的各种疑难问题，及时提供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中的斗争经验和最新科学研究成果，如此等等。也正是由于工具书能够比较迅速地提供学习和科学研究需要的参考材料，或提供这些材料的线索，解决各种各样的疑难问题，大大节省人们的时间和精力，所以它一向被看作“良师益友”，受到学术界的重视。

人们做学问，包括两方面：一是学，一是问。而且学问学问，学总离不开问。学习中遇到了问题问谁好呢？问老师，问同学，问图书馆咨询机构或向社会上知名学者请教，这固然很有必要，但总有一定的不便之处；不象查工具书，往往可以少受时间、地点等等条件的限制。

由此可见，重视工具书的作用，养成勤翻工具书的习惯，无论对于学习还是从事研究工作，都是大有益处的。

但是，必须指出，工具书、特别是文史工具书一般都反映了编纂者的阶级立场和政治态度，反映了他们对客观事物的见解和认识；同时，由于许多工具书编纂于不同的历史时期，反映了当时的生活现实和科学水平，所以，这些工具书也存在局限性和不可避免的缺点。再加这些书在编排和印刷出版过程中免不了出现技术性的疏漏或错误，因此，我们在使用工具书的时候，也要加以注意，要有一定的科学分析，尽量做到批判地利用，不要盲目地照抄照搬。

毛泽东同志说：“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抹杀工具书能够为学习、研究提供极大便利这一特点，持文化虚无主义的态度，不管青红皂白，一律加以摒弃，那是不对的；反过来，看不到工具书在观点、取材和编排方面的局限，全盘肯定，这也是极为错误的。

为此，我们在这里特地作一个总的声明：希望读者掌握上述原则，在使用工具书、特别是文史工具书的过程中注意这些问题，并且通过实践逐步去了解和辨别。我们在以后各章节一涉及具体问题，可能只讲这本书用处很大，那本书极有参考价值，而不再一一作分析批判，这是因为大量的工具书是旧时代遗留下来的，无论从观点到材料都可能存在一些缺点和错误，即使新出的工具书，也难免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假如每种书介绍时都要一一指出其全部糟粕所在，一则水平有限，二则举不胜举，似乎没有此等必要。

二、我国工具书发展的简况

我国的工具书，名目繁多，数量丰富，源远流长。

早在春秋战国之际，就产生了具有检字作用的《史籀篇》。东汉许慎编《说文解字》，成为我国第一部最有系统最为完整的古代字书，在语言文字学史上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年表的编制也很早，周代已有记载帝王年代的“牒记”；西汉司马迁著《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进一步创造出比较完整的历史年表体制。刘向、刘歆父子首撰《别录》和《七略》，班固因之编成《汉书·艺文志》，总列了此前简策书和帛书的目录。《诗经》是春秋以前平民和贵族诗歌的总集，梁昭明太子的《文选》是现存最早的诗文总集，此后这类书籍代有选辑，为今天查考古代诗文提供了方便。魏文帝命王象、刘劭等采集群书作《皇览》，“随类相从，凡千余篇”，为我国见诸记载的第一部类书。唐杜佑因刘秩《政典》而撰《通典》，成为第一部专详典章制度名物的政书。先秦古书《世本》和司马迁的《史记》、刘向的《列女传》等等，开始重视人物的活动，从事于人物传记资料的搜集、整理和编写工作；班固的《汉书·古今人表》、梁元帝的《古今同姓名录》则标志着人名索引或人名辞典的初步产生。此外，据可靠的文献记载，西周初年已有了地图，春秋战国以降，制图事业日益发达，但这些古地图都已佚失。长期以来传世的地图以南宋时期刘豫伪齐阜昌七年（1136年）石刻《禹迹图》、《华夷图》为最古；1973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发现绘在帛上的《地形图》和《驻军图》，乃是西汉文帝初元十二年（前168年）以前的作品，这又把我国现存古地图的时代推前了一千三百多年，为世界地图学史增添了灿烂的光辉！

随着文化科学的发展，印刷术的发明，以及各个历史时期的需要，近千年来，特别是清末以来，图书目录、报刊索引、字典、辞典、谱表、舆图、年鉴、手册以及文物图录等等工具书的编纂出版日益增多。新中国成立后，在党中央的领导下，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很大的胜利，工具书的编纂出版也取得了不少成绩；除编印了一些新的工具书外，对古代遗留下的仍然有一定用处的工具书，有计划有选择地逐步予以改编或重印，并翻译出版了若干国外的工具书。尤为可喜的是，经党中央和国务院批准，已经设立专门机构，着手编纂我国第一部严格意义的《百科全书》，这将标志着我国工具书出版的新阶段。

当然，人类总得不断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今天，中国革命已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根据国家建设的需要和科学技术的进展，有关单位正在试制适应现代科研要求的“电子检索器”，使检索工具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可以预期，随着检索工具的革新，今后工具书的编制、使用，一定会有大的改进和提高！

回顾以往，瞻望未来，我们满怀信心和自豪。但目前，填补缺门，对现

有各种类型的工具书给以研究、总结，使有关人员能充分加以利用，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服务，仍然是当务之急。

三、文史工具书的种类和本书的介绍方式

文史工具书的种类很多，一般都分为书目、索引、字典、辞典、年鉴、手册、年表、图谱、政书、类书和百科全书等类。

书目是图书目录的简称。它是记录图书名称、作者、卷册、版本、定价，间或叙及学术源流、图书流传、内容得失和收藏情况的工具书。其范围不仅包括《四库全书总目》和《全国总书目》这种综合性书目，也包括《中国地方志综录》、《历代人物年谱集目》、《司马迁著作及其研究资料目录》、《红楼梦书录》等专题性书目。

索引又称通检或引得，它是将书报中的内容编为条目，按一定的方法排列起来专供人们检索的工具。概括而言有书籍索引，如《尚书通检》、《十三经索引》、《廿五史人名索引》；报刊索引，如《全国报刊索引》、《文学论文索引》。

字典和辞典有时并为一类。总的说，它是解释字、词的声音、意义、用法和形体构造，间或叙及源流的工具书。我国古代没有字典、辞典之名，那时把解释字、词的书叫字书，旧的四部分类法中附属于“经部·小学类”。自清初敕编《康熙字典》，始有字典之专称；辞典或词典则更是后起的名词。所以说，字典和辞典可包括古代的《说文解字》、《尔雅》和《广韵》之属；也包括近代的《辞源》、《辞海》、《中华大字典》和《新华字典》之类；还包括《中国人名大辞典》和《中国地名大辞典》等专科性辞典。

年鉴是系统汇集年度时事文献和统计资料的连续性出版物。如《中国年鉴》、《世界知识年鉴》。

手册是汇集某一方面经常需要查阅的文献资料或专业知识的工具书，如《汉语方言调查手册》、《译名手册》。

年表是按年代顺序用表格形式编制的查考时间或大事的工具书。其中的纪年表供查考年代，如《中国历史纪年表》；历表可换算不同历法、纪年法的年、月、日，如《中西回史日历》；大事表则为查考大事及其年代的工具书，如《中国历史大事纪年》。

图录是用图象表现事物的工具书，它既包括《世界地图》和《中国历史地图集》等各种地图，也包括《中国历史图谱》和《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等各种文物图录。

政书是文化史专著，它汇编历代或某一代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制度方面的资料供人阅读和查考。如《通典》、《文献通考》、《唐会要》。

类书是我国古代百科全书式的资料汇编，有人也称它为百科全书，实际上两者之间是有区别的。类书是辑录群书中各门类或某一门类的资料，述而

不作，分类排比，以便寻检和征引，是查考古代事物的工具书，如《艺文类聚》、《太平御览》、《古今图书集成》。

百科全书有综合性的，也有专科性的。前者是完备的科学文化知识的汇编，搜集各科专门术语、重要名词，而加以详细的、系统的叙述和说明，各条目按字母或分门别类编排。后者所收条目则限于一个学科范围，只是较一般专科辞典为详备。

以往，论述工具书的著作，基本上都是沿袭以上类别进行介绍的。这种方法当然有它的系统性和科学性，但这样的分类与读者遇到疑难时所考虑的问题是两码事：它是将工具书分为书目、索引、字典、辞典、年表和图录等，而读者要查考的则是人物、地名、字词、年代、事物或一篇文章和一本书及其内容。两者的口径不同，自然势难吻合，所以往往对读者帮助不大。例如，要查考某个人或某地名，而查考人物或地名的工具书却分属几个类别：书目中既有人物传记和地方性资料，辞典中也有人名和地名辞典，索引中同样有人名和地名索引，乃至方志和地图也是查考人物或地名的资料。因此，假若对工具书缺乏全面、深入的了解，一时是弄不清楚哪一类别中有查考某种疑难的工具书的。

解放后，特别是近年来，不少高等院校相继开设了“工具书介绍”这门课程，编写了一些讲义和参考教材，其中有按上述方式介绍的，也有不约而同地摸索出新的介绍方法，即根据学习和工作中经常遇到的问题，从实际需要出发，分别介绍查考图书的工具书，查考字、词的工具书，查考人名、地名的工具书，等等。实践证明，这种讲授法还是较受欢迎的，有一定的群众基础。

为了使读者在阅读各章之前对本书有一个初步了解，兹将本书的结构和介绍方式分三点略予说明如下：

(1) 我们打破了前述工具书分类的界线，按查考问题的性质编排。如“查考字词的工具体书”一章虽保存了大部分的字典和辞典，而有关人名、地名、书名的专名辞典，按内容分别归入“查考人物的工具体书”、“查考地名的工具体书”、“查考书籍的工具体书”等章；有的类别如索引，就按内容和性质完全分散于有关章节之中；有的章如“查考地名的工具体书”，则是从书目、辞典、图谱、地方志等类集中了有夫材料而成，为我们所新设。

此外，有少数涉及面较广而又重要的工具体书，我们采用此详彼略的办法，如《辞海》，就归入《查考字词的工具体书》一章，详细介绍，其它各章则间或简略提及。

以上是本书在章节编排和介绍方式上和其它同类著作的第一个不同点，也可以说是本书的编制特点之一。

从查考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角度看，把有关工具体书集中起来加以介绍，读者可根据需要解决的问题直接查阅有关部分，省去几处翻检的麻烦，这样，既易读易记，又便于应用，其简便之处是显而易见的。

(2) 本书约计介绍了八百余种较为重要的中文工具书(日本人用中文或主要用中文编制的工具书,间或收录),其选择是否妥当尚成问题,有待于出版后吸收各方面的意见加以调整和修订,但估计大体上可以满足社会上的知识青年、大专院校文科学生和部分青年教师的需要。我们的收录原则是:第一,偏重古代部分。我国历史悠久,文化发达,古代遗留下来的文献资料和地下出土的文物极为丰富,但由于时代久远、社会变化等种种原因,使我们今天阅读古书或研究古代文物的时候,从语言文字到典章制度等各方面都容易碰到不少困难,这就迫切需要借助于各类工具书。第二,凡同类的工具书已被新出工具书所代替了的,一般不予收录介绍,至多在讲源流时简单的提一下;凡没有为新出工具书所代替的,则视其重要与否作不同程度的介绍。今以丛书目录为例,试加具体说明:丛书目录,以顾修编《汇刻书目》为最早。自《汇刻书目》以来,出现过不少收录几千种丛书的大型丛书目录,但从上海图书馆的《中国丛书综录》问世后,基本上都可以废弃不用,所以本书均不予收录;另有《丛书集成初编目录》虽系一种丛书的目录,却因为有一—3999册书的书号,便于索取,有它的可取之处,所以本书仍予简单的介绍。《四部丛刊书录》和《四部备要书目提要》也都是一种丛书的目录,因两种丛书选收得体,前者有简炼的版本说明,后者有书籍的解题,可视为导读书目指点青年以读书门径,故亦加介绍。

以上是本书在收编范围和介绍方式方面与同类著作的第二个不同点,也可以勉强说是本书的编制特点之二。

(3) 本书除《总论》以外,每章都分为“源流”和“使用”两节,节下再标若干细目。“源流”部分较为详细地介绍各类工具书的产生、发展的历史,它有助于青年同志了解各类工具书的历史和现状,从而有利于进一步掌握和更好地运用文史工具书,这也是现有介绍工具书的著作往往缺少或着墨不多的篇章。“使用”部分尽可能做到既有概括性的综合介绍,又分门别类从不同角度介绍查找资料或解答问题的方法和途径;一般需要介绍的工具书都有简单的解题,涉及较为重要的工具书时,另写略为详细的内容提要或评论,有时还结合具体情况穿插一些实例,以启发思考和提高读者使用工具书的能力和兴趣。

上述编制结构或介绍方式,是为本书的特点之三。

以上所谓特点,只是表示与同类著作有所不同而已,并不一直都是优点。总之,现在写成的这个样子,它究竟符合不符合读者的要求,还有待于实践的进一步检验。希望通过实际使用,通过广泛听取意见,今后作进一步的补充修改,使之不断提高和逐步完善。

四、怎样使用工具书

我们在学习或研究工作中,常常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例如,不了解某些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不知道有些成语典故的涵义和出处,对中国历史

上的年月日期不能以公元或回历作换算，看到冷僻的字词与生疏的人名、地名无法辨认和解释，或是刚参加某一问题的探讨，不知首先应读什么书，收集什么材料，也不知学术界过去对这个问题已研究到什么程度，今后该从哪方面多下些功夫，如此等等。为要迅速解决这一系列问题，不仅要利用工具书，而且要善于使用工具书。

我们的看法，所谓善于使用工具书，大体上需要具备下列三方面的基本知识或技能：

第一，要利用工具书查找资料或解决我们的疑难问题，必须首先了解目前究竟有些什么工具书可以供我们使用。这是一个先决条件。因此，我们平时要关心工具书的出版情况，要熟悉书目和掌握必要的目录学知识，懂得做学问的门径。

第二，要学会使用工具书的具体方法，即注意工具书通常的编排形式，亦即熟悉并掌握工具书的各种排检方法，其中包括“图书分类法”，“部首检字法”，“拼音字母检字法”，“四角号码检字法”等等，这样就会得心应手，拿起工具书便能迅速找到自己需要的材料或答案。如果碰到没有接触过的而且是编制较为复杂的大部头工具书，那就要仔细阅读它的凡例和序跋，弄清它的收编时限、取材范围，以及它所使用的符号或省略语的含义，切不可在没有弄清编例之前粗心大意地一翻而过，把本来可以找到的材料或是漏掉一部分，或者根本找不到，还对工具书妄加批评，结果是贻笑大方。

第三，要有的放矢，学会针对问题比较准确地选择工具书的本领，力求少走弯路。

问题是无限的，工具书是有限的。碰到工具书确实不能解决的问题，还必须查阅别的非工具书，即查其它专著和论文资料，这是我们应该知道的最起码的常识，这里不多谈了。就目前而论，最常用的文史工具书约有上百种，较为常用的多达数百种、近千种，而实际可以被我们利用的又何止千万种！当你在学习或工作中遇到困难的时候，需要在大量工具书中选择恰恰是自己急需检索的工具书，这个问题说简单也很简单，你要找图书就去翻书目，年代问题查年表，普通字词或人名、地名等等查有关辞典或索引，总之，若是容易解决的问题，可以一下就找到答案；说它难，那可实在有些难，一些较为冷僻和复杂的问题，决不可能随便翻查一、二种工具书立即得到解答。

在后一种情况下，有的人要末束手无策，要末病笃乱投医，不管什么工具书拿来乱翻一通，结果花了很多时间还是一无所获；但有经验的人仍然能够比较顺利地找到答案，虽然有时可能也要经过一番周折，可是由于他们脑子里有时间和空间的概念，熟知各种类型的工具书的性能和作用，能够从不同的角度合理地试加查找，即使处在“山重水复疑无路”之境，也终于会找到线索和解决疑难。这中间有一个“经验”问题。这是很重要的一点！有没有“经验”，实际上也就是能否善于使用工具书的一大关键。

然而，经验不是凭空得来的，那是需要同志们在反复使用工具书的过程

中，一点一滴地积累，逐步地加以掌握。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一切真知都是从直接经验发源的。”所以，要达到准确地选择和运用工具书的地步，主要靠实践，靠多接触、多翻检，这样自然会“熟能生巧”。但是，话又得说回来，“人不能事事直接经验，事实上多数知识都是间接经验的东西”，这就是说，在强调实践的同时，并不排斥间接的知识，更不是不要别人的经验作借鉴。相反，可以而且应该通过阅读有关工具书的介绍文字，从中得到启发和帮助，得到必要的基础知识。这也就是本书编写的目的所在。

第一章查考书籍的工具书

查考书籍的工具书，主要指各类书目而言。书目即图书目录的简称。它一般只记载书名、卷数、作者、版本等项目，有的兼详图书的流传情况、主要内容与优缺点，以及书籍的真伪和文字的讹误等问题。所以，不论何种形式的书目，除了便于读者查我图书和利用图书以外，也还具有揭示图书内容、宣传图书和指导阅读等重要作用。因此，正如革命导师列宁所指出，目录学的阶级性和党性原则是极其鲜明的。那种认为目录学只是提供便利的讲法是不对的，至少是片面的。

现就我国书目的编制和图书分类的演变，以及怎样查找各类书籍的方法，分别介绍如下。

第一节我国书目的编制和图书分类的演变








一、我国书籍的发生和发展

要讲书目的编制和图书分类的演变，首先得介绍一下我国书籍的发生和发展的简单历史。因为书目是随着书籍的发生、发展而产生与发展的。离开书籍发展这个前提，就没有书目和图书分类可言。

根据文献记载，早在距今四千多年的夏代，我国已有了典籍。由于目前尚没有充分的实物作为佐证，夏代的事就暂时不去讲它。

《尚书·多士》称：“惟殷先人，有册有典。”

《吕氏春秋·先识览》：“殷内史向挚见纣之愈乱迷惑也，于是载其图法，出亡之周。”

这说明商代已有典籍。商代已有典籍，除了上引资料外，还有没有其它证明？有。甲骨卜辞有“禹册”、“祝册”、“工典”等文字，册作，象以丝绳或皮革贯穿简牍为一束的形状；典字作，象两手捧册之形。金文册字与甲骨文略同，典字或作，象简册阁置于上。汉许慎《说文解字》：“……从，在兀上尊阁之也。”又：“，古文典，从竹。”另外，从记载和实物都证明商代已有书写典籍的工具和材料，例如笔和竹帛之类。不过，由于简牍比甲骨更难保存，所以商代的这种典籍至今未能发现。

殷墟出土的商代后期的甲骨文，近年于周原发现的西周初年的甲骨文，主要是商周王室的占卜记录，刻写于龟甲兽骨之上；商周的金文是刻在青铜器上的铭文，最初字数很少，至西周逐渐增多，其中如《毛公鼎》铭文近五百字左右，多属祀典、锡命、征伐、契约等有关的纪事，史料价值很高，但还不能算是正式的书籍。

我国现存最早的文献《尚书》，主要记周代的历史，其中有《商书》五篇，据学者考定，仅《盘庚篇》是商代的作品，其余都是后人的追叙。

西周和春秋时代的典籍，据说已日益增多，并且有了专门管理典籍的官吏和藏书的府库。可惜当时的书籍多半已经佚失了。今天见到的《尚书》、《诗经》、《春秋》等等，是经过辗转流传保存至今的少数珍贵著作。

从商代到春秋末年，正处于奴隶社会所谓“学在官府”的时期，文化教育由统治阶级中少数人所垄断，私人著书立说的情况基本上还没有发生。所以，当时的所谓书籍，实际上仅是政府的文告等档案资料的汇编而已。从录写材料来说，或甲骨，或青铜器，或石头、竹签、木片等等，也还没有固定。总言之，这是我国书籍的发生时期，在书籍发展史上属于初期阶段。

春秋战国之际，由于冶铁事业的发展，铁器工具普遍应用于农业生产，又因牛耕的普及、水利的发达和农业耕作技术的进步，生产力有了显著的提高；与此同时，手工业、商业也迅速发展和繁荣起来。这样，随着社会经济的大发展，就引起了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化的社会大变革。这时候，旧的奴隶制的生产关系已经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奴隶和奴隶主的矛盾、平民和奴隶主的矛盾日益尖锐，新兴地主阶级便利用奴隶暴动、平民斗争等力量，向奴隶主贵族展开激烈的夺权斗争，首先在三晋、齐鲁等国先后建立了地主政权，以后秦楚燕等诸侯国家也普遍加快了封建化的进程。表现在文化思想领域里，就出现了一个百家争鸣的局面：各阶级的代言人，纷纷著书立说，各自为本阶级争取政治、经济和文化学术地位而大造舆论，《墨子·天志上》称“今天下之士君子之书不可胜载”，正是这种情况的写照。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焚书坑儒”，对图书发展事业一度投下了浓重的阴影；汉初，“广开献书”之路，许多门类的著作物又相继产生。直到东汉时期，基本上仍处于封建社会的上升时期，社会的经济、文化继续有所发展，书籍也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战国至两汉，竹木制的简策，成为书籍的主要形式；虽然在战国时代出现了帛书，在后汉又出现了纸书，但简策一直居于主要地位。因此，这一个时期可以称为书籍发展史上的简策时期。

《墨子》一书常讲“书之竹帛，镂之金石，传遗后世子孙”。《韩非子》也讲“先王寄理于竹帛”。甲骨、金、石用以刻字，竹、帛用以书写，正是先秦以来实际情况的反映。古书上说的“惠施多方，其书五车”；秦始皇规定每天批阅文书一石（一百二十斤，合今六十斤），都是简牍。我国历史上关于这类文书曾几次大的发现：第一次是汉武帝末年鲁恭王破坏孔子旧宅，发现战国时代人用古文（所谓“蝌蚪文”）抄写的《尚书》、《礼》、《论语》、《孝经》等儒家经典，每简二十字到二十五个字，与当时通行的隶书（称今文）不同，有人相信有人怀疑，从而引起了经学上的今古文之争。第二次是晋武帝太康二年（281年）汲郡有一个名叫不准的人盗发战国魏襄王的坟墓，因而发现十几万根竹简，后经荀勖、束皙、和峤等整理，共得《竹书纪年》、《穆天子传》等十六部古书。每简长二尺四寸，四十字，墨写，用素丝编连。此后清光绪末年英人斯坦因于新疆、甘肃一带所得汉魏简牍文书“流沙坠简”，1930年在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河流域得前汉中期到后汉初期

近万根木简，称之为“居延汉简”，皆是公文而非书籍。解放后，1952—53年在长沙五里牌、仰天湖、杨家湾等地古墓中发见了几十根竹简，都是战国时楚国的遗物。1957年在信阳长台关楚墓中又发见了一批，也是战国时楚国的遗物。1959年在武威汉墓发见了五百零四根竹、木简，其中四百六十九根是前汉末年抄写的《仪礼》，计有《乡饮酒》、《丧服》等七篇，每简长二尺四寸。由此证明，古书讲先秦简长二尺四寸，用以写经典、法律和国史，一尺二寸用以写《孝经》等书，八寸写传记和诸子百家的书籍是有一定依据的。秦汉以后，根据王国维的考证，简长有二尺、一尺五寸、一尺、五寸的区别。这些简，或用丝绳，或用皮革编连。《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晚年而喜《易》；读《易》，韦编三绝。”韦为熟牛皮。孔子晚年反复读《易经》，把穿连竹简的牛皮磨断了三次，这个记载生动地反映了古书的面貌和古人刻苦学习的精神。

帛书产生于春秋战国之交，直到汉代还应用。帛是一种丝织品，或称缣、素，价值较为昂贵。近几年长沙马王堆汉墓中就出土过这种帛书（如《老子》、《十大经》等）。

从三国到唐末，这时是我国封建社会的中期，书籍的发展已进入第三阶段，是纸写本盛行的时代。《晋书》记陈寿《三国志》成，时人多爱抄录；左思撰《三都赋》，京师豪贵竞相传抄，一时洛阳为之纸贵，就是纸写本盛行以后的一种反映。近年于新疆发现晋写本《三国志》、唐代卜天寿抄《论语郑注》、唐《西州营名籍》等，都是用的帘纹纸，这又提供了新的例证。

起初，纸书同帛书一样，是卷轴式。纸书逐步代替简策和帛书，到隋唐而达到极盛时期。它的生产方法是手写，虽说雕板印刷于唐代已发明，但尚未推广。《汉书艺文志》著录书籍有篇、卷之分，称篇者为简策，称卷者为帛书，纸写本继承了帛书的形式，所以这个时期亦可称为卷轴时期。

我国是首先发明纸的国家。据考古发现，早在西汉初年就发明了植物纤维纸，扩大生产则要到东汉蔡伦改进、推广以后。但东汉一代，甚至到了三国两晋时期，少数贵族、文士尚有贵素贱纸的风气，南北朝以后纸书才普遍推广。

魏晋时期，由于书籍的发展，公私藏书极为丰富。隋文帝时政府向民间搜求异书，校写完毕，原书归还，并每卷赏绢一匹。政府召集全国字写得好的人抄录书籍，凡三万余卷。唐玄宗时特设修书院，专掌抄校书籍。又佛教自两汉传入，经魏晋南北朝以至隋唐达到极盛。按照佛教教义，传播佛经功德无量，所以自西晋以来，佛寺和教徒尽力抄写经书，广为流传，而雕板印刷之首先就是从印刷历书和佛经开始，这不是偶然的。

从五代至清代的中英鸦片战争，属我国封建社会的后期，虽然社会矛盾不断加深，但在书籍发展史上却是极为重要的阶段。这个历史时期，印刷术成为书籍生产的主要方法，并且有了辉煌的发展。书籍的形式已定型为册叶，并且经过发展而达到线装的形式。1900年敦煌发现唐懿宗咸通九年（868

年)印的《金刚经》，是我国已发现的最早的印刷物。印刷术从我国传播到东方国家，已有更早的实物发现，一为 770 年左右的日本刻《陀罗尼经》，一为 704—751 年间新罗刻的《陀罗尼经》。这都足以说明，我国雕板印刷的发明，可以上推到初唐。雕板印刷发明之初，主要印历书和佛经，到五代后唐时宰相冯道建议刻印儒家九经，而于后周时完成，从此各级政府官署都以刻印经史书籍作为一项重要工作，这对书籍的刊印出版事业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随着印刷书籍的盛行，印刷术也不断改进和发展。其中最重要的是活字印刷术和套色印刷术的发明。北宋仁宗时毕昇发明泥活字，元王祜又创造木活字，使我国印刷事业又从雕板印刷向前跨进了一大步。明代除木活字外，还使用铜活字和锡活字。另外，发明于元末而盛行于明中叶以后的套色印刷术的发明和发展，都为我国刻书事业的重大发展提供了物质条件。

从鸦片战争以后的一百多年，中国社会经过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苦难历程，但我国书籍出版还是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传统的手工业印刷术逐步为机械化印刷术所代替，册叶制度虽然还保持着，而书籍的形式已由线装变为平装和精装。这样，书籍印刷过程加快了，书籍形式又改变得更便于阅读和收藏，随着科学门类的日益增多和社会文化水平的有所提高，出版书籍的品种和数量，都大大增加起来。当然，其中确有大量好书，但反映这段时期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制度腐朽性的糟粕之类出版物也不少。

二、书目的产生和图书六分法

春秋以前，由于书籍尚处于发生时期，数量有限，当然没有必要编制书目。春秋战国之际，随着学派的崛起，图书的增多，这才使划分学派和依学派而将学术思想或图书进行分类，其中包括编制书目等等工作，逐步提上了议事日程。

早在春秋末年，孔子以六艺分科教授学生，可以说是我国进行学术思想分类的开始。《庄子·天下篇》分诸子百家为七派，评论颇有见地。《荀子·正名篇》关于“究名实”、“辨同异”的论述，所谓“同则同之，异则异之”等等，应是我国较早的分类原理。荀况的《非十二子》和汉代的《淮南子·要略》等篇，都对学派进行了具体分类。而司马谈论六家之要旨，分析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各派之特点和相互关系，论述尤为精到，可以说是对先秦以来学术分类的一个总结。所以梁启超说：“庄、荀以下论列诸子，皆对一人或其学风相同之二三人以立言。其彙括一时代学术之全部而综合分析之，用科学的分类法，釐为若干派，而比较评鹭，自司马谈始也。”（见《饮冰室合集》，文集第十八册）

分类学在科学研究上占有很重要的位置，它能指导研究的途径，由特殊到一般，由一般到特殊。图书分类与学术分类虽有所不同，但就我国古代来

说，二者之间关系至为密切。如西汉末年刘向、刘歆父子首撰《别录》、《七略》，是我国最早的国家书目，也是我国目录学的真正开创者。刘歆《七略》中的诸子略，即以司马谈所分六家为主类，益以纵横等家，就是很好的证明。

《隋书·经籍志》认为我国目录的体制起源于《诗》、《书》的序：“古者史官既司典籍，盖有目录以为纲纪。体制湮灭，不可复知。孔子删书，别为之序，各陈作者所由。韩、毛二《诗》，亦皆相类。”（见《簿录篇》小序）

《诗》、《书》的序是否孔子所作，这早已成了问题。不过不管怎么说，它和司马迁《史记》、扬雄《法言》的自序一样，分释各篇的旨意，是一种图书的目录，也是我国目录的最早体制之一。

秦始皇焚书时，李斯定下法令：史官非《秦纪》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史记·秦始皇本纪》）据姚名达先生《中国目录学史》的意见，这种全国范围的行动，倘若政府没有图书分类目录下达，即没有目录以为纲纪，吏民势将无所适从。所以，仅从这个法令加以分析，也可以推想当时一定有了图书分类目录的编制。

秦末农民大起义，彻底摧毁了秦王朝的残暴统治。《史记·萧何传》：“沛公至咸阳，萧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汉书·艺文志》：“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与秦代焚书相反，汉初采取重视收藏图书的政策，按理来说，也要对图书编目登记，做一些最必要的目录工作。另据《史记》、《汉书》的记载，高祖时尝令萧何次律令，张良、韩信序次兵法，张苍为章程，叔孙通定礼仪，对有关图书显然要进行审校和整理，这无疑为西汉初年大规模的官校书籍的一个创举。

自文帝、景帝时期采取一系列恢复和发展生产的措施，到了武帝时候，国力已相当强盛。为了适应中央集权的需要，在文化上推行崇儒术、黜百家的方针，广开献书之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于是“百年之间，书积如丘山”。当时为配合抗击匈奴等军事上的需要，又让杨仆进一步整理兵书，“纪奏《兵录》”。到了成帝时候，“以书颇散亡，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每校完一部书，都由刘向写一篇简明的内容提要给成帝等阅览，所谓“每一书已，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以上见《汉书·艺文志》）当时曾把这些提要另写一份，汇编成《别录》一书，这便是我国第一部解题式书目。

刘向死后，他的儿子刘歆受哀帝之命，继续校理群书。他在《别录》的基础上，对序录删繁就简，进一步将全国图书详加分类，编成《七略》一书。前面所说《诗》、《书》的序，乃是一书之目录，杨仆之《兵录》，为兵法一类书籍的总目，《七略》则是校理全国图书而编成的综合性的群书目录。

《七略》有集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

其中集略为后列六略的总序及总目，所以实际上只分六大类。我国古代图书主要有六分法和四分法两大系统，六分法即创始于刘歆的《七略》。

刘向、刘歆综合了西周以来主要是战国的文化遗产，经过选择、校勘、写成定本和分类编目等程序，并且写了学术性的总论和分论，工作是艰巨的，成绩是显著的，特别是《七略》，它不只是一部目录学的巨制，同时也是一部极可珍贵的古代文化史。它们的产生不是偶然的，一方面是以当时政府丰富的藏书为先决条件，另一方面也是先秦以来有关学术思想分类，校理和序录图书经验积累的必然结果。如果说先秦至西汉中期是我国目录学的萌芽时期，那么西汉末年刘氏父子在校书编目事业上的卓越贡献，就标志着我国目录学的正式建立，对于我国封建社会的目录事业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宋郑樵、清章学诚等对《七略》均有所批评。诚然，《七略》所分类目并非尽善尽美，但初创之际，能有如此成绩，已属难能可贵；不足的地方，后人自应求得不断的改进，而不能苛求于古人！

《别录》二十卷、《七略》七卷，唐代已佚失。班固的《汉书·艺文志》，即删改《别录》、《七略》而编成，是我国现存的第一部著录式书目，也是第一部史志书目。由于史书体裁和篇幅的限制，班固删掉了刘书大量的叙录，又把《集略》分割开来，属于总论性质的列于六略之前，大序小序则分别置于六略及三十八种之后，增加了刘向、扬雄、杜林等人的著作，在细目和具体归类方面有所变通和改进，特别是注明“出”、“省”、“入”若干篇，以示更动之处，态度较为严谨。唐刘知几批评他“因人成事”，然而《别录》、《七略》以及汉代社会学术思想和文化典籍的状况，均赖班志而可考见其梗概，其功似不可没。清代学者金榜说：“不通《汉书·艺文志》，不可以读天下书。《艺文志》者，学问之眉目，著述之门户也。”（见王鸣盛《十七史商榷》）这当然不光是对《汉书·艺文志》的推崇，而是对刘向以来所建立的目录学的重视和肯定。

三、书目的发展和四部分类法

自《七略》创图书六分法，历东汉、三国基本上沿用不改，可算是我国封建社会目录学的第一个时期，亦即目录学的成立时期。

魏晋之际，由于战乱和政局的波动，地主阶级中间较为普遍的产生一种逃避现实斗争的倾向。反映在文化思想方面，那就是摆脱儒家传统的束缚，促成玄学和佛、道二教的兴盛。在史学方面，因受《史记》、《汉书》的影响，私家修史的风气极为盛行，史部著作明显地增多，其中与“门阀制度”多少相联系的人物传记、氏族谱以及地方志书的大量涌现，尤为突出。文学方面，五言诗的兴起，骈体文的发展，诗文集和文艺理论著作的出现，也突破了诗赋的范围而起了很大的变化。凡此种种，不能不反映到图书分类中来，给编纂目录提出新的课题。

魏秘书郎郑默所制之《中经》，仅仅“考核旧文，删省浮秽”，尚未于《七略》之外另创新的分类法。至晋“秘书监荀勖，又因《中经》更著《新簿》，分为四部，总括群书。一曰甲部，纪六艺及小学等书；二曰乙部，有古诸子家、近世子家、兵书、兵家、术数；三曰丙部，有史记、旧事、皇览簿、杂事；四曰丁部，有诗赋、图赞、汲冢书。”（《隋书·经籍志》）甲部即《七略》之六艺略，乙部包括诸子、兵书、术数、方技等四略，丙部由六艺中《春秋》类目所附史书扩大而成，丁部即诗赋略，增以图赞和汲冢新发现的古书。这是我国第一部以四部区分图书的分类目录，也是在《七略》体制上加以改进、创新的最初尝试。

此后李充撰《晋元帝四部书目》，更换了乙、丙两部的次第，使甲部纪经书，乙部纪史书，丙部纪子书，丁部纪集部书，由此成为后世四部分类法的永制，为东晋以后十余部官修书目所沿用。

宋王俭撰《七志》，梁阮孝绪综合《七志》和《文德殿四部目录》撰成《七录》，这是官修书目发展的同时，个别学者探索新分类法的典型。《七录》十二卷，分内外篇：内篇是经典、纪传、子兵、文集、技术五录；外篇是佛录和道录。《七志》、《七录》等书早已失传，但《七录》序被保留下来，成为研究我国古代目录学的一篇重要文献。另外，由于佛经的增多，道安尝撰《综理众经目录》，其后僧佑增辑成《出三藏记集》。前书佚失，后书保存至今，成为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佛经目录。

唐宋时期，文化极为发达。印刷术的发明，更为各类图书的出版提供了物质条件。因此书目的编制和图书分类也随之发展而演变。

唐魏徵等根据当时政府的藏书，参考了《汉书·艺文志》和《七志》、《七录》等书，把图书删并为四部四十七类，并直接冠以经、史、子、集的名称，编成《隋书·经籍志》。这是我国现存的第二部史志书目。它依班志的体裁且有所补阙，首有总叙一篇，四部有后叙四篇，分类有小序四十篇，道、佛叙二篇，末有后叙一篇，合共四十八篇。它是研究唐以前学术源流及其演变，以及刘宋至隋图书概况的重要文献。

魏晋以来至《隋书·经籍志》所完成的图书四分法，直至清代编纂《四库全书总目》，在长达一千多年的时间里，基本上为历代公私书目所采用，成为目录学史的主要潮流，这便是我国封建社会目录事业的第二个时期，即目录学的发展时期。

刘知几批评《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重复”、“汗漫”，认为史书不必撰《艺文志》或《经籍志》，就是撰的话，断代史也不应该兼收前代遗书，所以他的结论是：“凡撰志者，宜除此篇；必不能去，当变其体。”（《史通·书志篇》）我们今天从查考古代图书的流传和学术的演变来看，当然完全可以责之以“偏激”二字。但从编纂体例包括具体分类来说，无论《汉书·艺文志》还是《隋书·经籍志》，也确实存在不少缺点。刘知几在《六家篇》中，以《尚书》、《春秋》等儒家经典与《左传》、《国语》、

《史记》、《汉书》并列为史，《春秋》与《左传》也各为一家而不分主辅，这种“援经入史”的主张恰好与《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所代表的儒家传统思想针锋相对；他在《杂说》、《申左》特别是《疑古》、《惑经》等篇中又对儒家经典多方抨击。凡此种种，使我们多少能领略“必不能去，当变其体”的真意。因此，从这一角度来看，他的意见又不无进步意义。

《隋书·经籍志》以后，唐、宋、明、清诸史都有艺文志或经籍志。从汉到宋，各正史艺文志都是根据当时政府藏书而编成，故兼收前代遗书；《明史·艺文志》改为专收一朝之著述，《清史稿·艺文志》仍其旧，这种形式的改变应是受刘知几的影响，但在分类体制上并没有实质性的改进。

除史志书目外，唐宋以来还出现不少有名的官私书目。官修书目如唐元行冲、殷践猷、毋斐等编的《群书四部录》，毋斐在此基础上单独改编的《古今书录》，北宋王尧臣、欧阳修等编的《崇文总目》等等，都是极有名著作，有些史志书目即以上述书目为蓝本。今三书并佚。私家书目如宋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題》，是有名的解題书目。明清两代私家书目甚多，张廷玉进呈的《明史·艺文志》实即王鸿绪的《明史·艺文志》，而王书即依据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删改而成。这些私家书目，分类多依四部，但随着图书的增加，子目变动较大，许多原被认为不登大雅之堂的小说、戏曲，在《百川书志》等私家书目中就有所反映。

清乾隆时纪昀等所撰《四库全书总目》，也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是我国封建社会走向没落时期一部最大的图书目录，也是沿用《隋书·经籍志》所开创的经、史、子、集四部分类的一个总结性目录。直到今天一些图书馆关于古籍的分类，仍然受到它的影响。由于它是配合《四库全书》禁毁、删节、窜改古籍以维护封建统治的一部官修书目，所以在收编《四库全书》时，凡对清王朝统治不利的书籍谓之曰“违碍书籍”而均予禁毁，不准流传，《总目》也不著录。在《总目》凡例中，又规定了这样一条著录原则：“惟离经畔道、颠倒是非者，掎击必严。”因此，象王充、王安石、李贽等人的著作倍受诽谤和攻击就不言而喻了。

《四库全书总目》共二百卷，分经、史、子、集四部。经部分易、书、诗、礼、春秋、孝经、五经总义、四书、乐、小学十类；史部分正史、编年史、纪事本末、别史、杂史、诏令奏议、传记、史钞、载记、时令、地理、职官、政书、目录、史评十五类；子部分儒家、兵家、法家、农家、医家、天文算法、术数、艺术、谱录、杂家、类书、小说、释家、道家十四类；集部分楚辞、别集、总集、诗文评、词曲五类，合共四十四类，六十六个子目。另有总序和小序，有些子目附有简短的按语。它是研究我国封建社会文化史思想史的重要参考资料，对于了解我国古籍的版刻、源流、文字异同以及著者事迹等等，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值得一提的是南宋初年郑樵撰《通志》，其艺文、图谱二略记载了历代书籍和图谱，校讎略则是一篇重要的目录学理论著作。元马端临根据历代官